

布尔什维克化与本土化: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 双重变奏

许金华

(南昌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9)

摘要: 中央苏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下, 积极推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但囿于苏区实际, 苏区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面临诸多困境。中央苏区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中国化、话语群众化和实践本土化三个维度进行了积极探索, 党的建设上演了布尔什维克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变奏。

关键词: 布尔什维克化; 本土化; 党的建设; 中央苏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3)06-0026-08

Bolshev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 Double Variation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XU Jinhua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9, China)

Abstract: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Central Par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uild Bolshevizatio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ctively promoted the Bolshevization of the Party. But limited by the reality of the Soviet Area, the Bolshevization of the Party building in the Soviet Area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has actively explored three dimensions of Party building: Sinicization of theory, mass discourse and localization of practice. Party building has staged a double variation of Bolshev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 words: Bolshevization; localization; Party build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关于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但围绕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研究不多^①, 且现有研究多着眼于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领导个体在这一问题上的作为,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整体性研究仍然缺乏, 围绕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党建布尔什维克化与苏区本土化的关系研究则更是少见。

一、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

1924 年 6 月 17 日,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提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

^① 主要有王晓荣、王鑫《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 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 年第 1 期; 赖纪卿、谢从高《周恩来与中央苏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 载《决策与信息》2020 年第 1 期; 茅文婷《任弼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家”》, 载《党史博采(纪实)》2015 年第 5 期; 等等。

收稿日期: 2023-04-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苏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及其经验启示研究”(编号: 18BDJ043)

作者简介: 许金华(1974—), 男, 江西乐平人,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史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1]29}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指“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中过去和现在一切具有国际意义、普遍意义的东西,应用到我们的各个支部中去。”^{[1]30}会议要求,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里面一切具有国际意义的东西吸取过来供自己使用”。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了各国共产党实施布尔什维克化的五个建设目标:一是党必须是真正群众性的政党,时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二是党应该有机动灵活的策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战术对付敌人,而不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是党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勇往直前,为争取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斗争;四是党应该是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在党内不允许有派别集团的存在;五是党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1]29-30}。

1925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制定出台《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对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原则和方法。《提纲》指出,俄共(布)是在和“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左’的革命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1]118-119},但各支部“要达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该精确地考虑到时间地点的一切具体情况”^{[1]119};要布尔什维克化就必须先争取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尤其是广大工人阶级要作为争取的首选,在组织方式上要充分利用好工会这一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党的内部,要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尤其是工厂党支部的作用,而不是把支部仅仅建立在选区里,“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产业部门的党支部”,“如果不把组织建立在工厂支部的基础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1]141-142}。《提纲》对“布尔什维克化”在干部建设上亦做出了要求,“必须做到使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工人化”;在作风建设上,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首要前提之一”,党应是集中的、紧密团结的和组织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党^{[1]143-144}。

综上所述,作为党的建设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化”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在思想建设上,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由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修正主义,且这一思潮对各国各地,尤其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仍有较大影响,为肃清这一错误思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共产国际要求作为国际各支部的党组织,一定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界限,要建设成为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不要“修正主义”化而要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二是组织建设上,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成员要以工人无产阶级为主导,党的基层组织要以工人阶级支部为主。三是作风建设上,要建成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组织。

早在1925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化”字样。“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2]374}次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布尔什维克化”开始作为党的建设目标被提出,“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什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要能做到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要能做到从支部基础的工作到大的群众行动,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3]180}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党要成为“波尔扎维克的党”,强调“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扎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上和实际上也是如此”^{[4]87}。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召开的,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将失败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基础不足,并因此而导致的“右倾”错误,所以“六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明确了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即:在加强支部建设、改进支部生活的基础上,“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5]81},号召全党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与共产国际步调一致,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不足息息相关。瞿秋白分析认为“党在那时候的确是一个群众组织,同时在革命之中也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还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的组织是任其自然的发展,没有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团结。”^{[6]404}1927年,

“八七会议”对大革命的失败进行原因总结,认为党中央在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达到“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4]255}。

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一直是中央对其进行工作指导的思想和方针。1929年2月,作为巡视员来到井冈山的杨克敏在报告中写道“因为根本是个农民区域,所以农民党的色彩很深厚。”^{[7]136}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8]77}，“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8]74}。面对这一相同的现状,毛泽东和杨克敏在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及问题的性质上持不同主张。杨克敏认为党的农民成分居多,改变了党的阶级属性,成为“农民党”;且认为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实在很难使农民有进步的思想发生”^{[7]136}。这一主张明显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正统观点,即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必须通过党的无产阶级化才能实现。而毛泽东则主张,可以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群众的方式,通过宣传和教育来进行革命教育,提升农民的政治觉悟,将其改造成布尔什维克,“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且“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8]63-64}。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为苏区党的建设提供了指导,明确了方向,规定了目标,为苏区党的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机械地执行,发展党员和选人用人的“唯成分论”,开展党的改造工程,强调要实现党的领导工人化、党的基础无产阶级化,对苏区正确的政策方针多加指责等。例如,1931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批评苏区政治路线上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问题上犯了“游击主义”;在党的组织上是“狭义的经验论”。1933年2月,中共中央又在苏区集中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对工作中有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并于同年3月,向江西各地推广,开展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布尔什维克化的实施加剧了党中央“左”的错误在苏区的蔓延扩张。

二、布尔什维克化的苏区困境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要求,在苏区面临着比城市更多的挑战,究其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一方面,苏区当地民众多为乡村的农业生产者、小生产者,工人无产阶级很少;另一方面,苏区外来人口多为红军(部队),无产阶级也不是其主体。红军领导和创立者毛泽东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8]63}苏区主体人口的非无产阶级化自然导致苏区新增党员的非无产阶级化。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又使其在思想认识、作风纪律上达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甚至把许多不好的做法和作风带到了苏区党、政府和军队中来,以至于毛泽东在面对这一窘况时亦感慨道:在边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8]74}。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属性,组织工人和开展工人运动是党初期的中心工作,体现在党的成分上,工人阶级占据着最大比例。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员队伍状况时提到,党员从1924年的“四大”时“九百九十四人”已增加到“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9]51}党员的成分根据会前3月份的统计,“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八;农民占百分之十八点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军人占百分之三点一;中小商人占百分之零点五;其他成分占百分之四点二”^{[9]52}。当时工人占到了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

然而,大革命失败后,工人占党员成分为主的状况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源于大革命失败后,原有党员在白色恐怖下或牺牲或离散,新增加的党员又多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据1929年6月党中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的数据,工人党员的成分仅占全党百分之七^{[10]215}。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的相关统计,当时当地党员中农民占80%,工人占10%,知识分子及商人占10%。同属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的闽西,当时党员中工人也只占13%,其余包括60%的农民、

10%的分子和商人。两地党员中的工人所占比例皆十分低,而且这些工人还不是产业工人,多是农村的雇工和手工业工人。^{[11]165}

党员成分的非无产阶级化居多,党内思想文化在没有外力转变的前提下容易呈现“非无产阶级化”,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思想和作风上的建设目标亦多难达到。1930年2月28日,闽西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对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12]582}红四军来到赣南、闽西之后,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样存在,“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重大原则问题,有人也产生了动摇。党内军内对党代表权力、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队与地方武装的关系、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等问题,争论不休”^{[11]166}。1929年6月,为进一步解决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会前以党内通讯的形式对红四军党内14种错误思想进行分析总结,并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刊登^{[11]167}。但毛泽东的努力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未能奏效,“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13]1569}。1929年,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再次进行总结,概括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氓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个方面^{[8]85-95}。

思想的改变和作风的改进非一日能成,且一时难以量化,因此,在成分上进行无产阶级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方向,“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14]717}。1931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要求“各苏区党的改造工作,必须有系统的进行”^{[13]1619},改造的目标首先就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首先是党员成分,必须以城镇工人与乡村雇农为基础,坚决的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应停留的将他们洗刷出去。”“各苏区要在这一认识上,去进行各级党部的改造,从支部到省委,都应在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定期召集支部全体会、区委、县委、省委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各级党委。”^{[13]1620}

但事实上,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员居多的情况在苏区始终未能改变。1933年5月,在当年红五月活动中征召入党的成员中,工人仍然只是少数。据江西省委统计,当时新发展的党员中,属于工人阶级范畴的(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不到三分之一^{[11]165-166}。红军中的党员成分,与地方党组织大致相同,红四军“有党员一千三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十六点六。党的组织基础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军起义的和战争中的俘虏。在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5]96}。

三、党的建设的苏区本土化实践

面对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不足,中央苏区党和政府一方面积极落实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一方面根据苏区实际和实践进行本土化的调适,苏区党的建设在布尔什维克化和本土化的三重变奏中探索前行。

(一) 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苏区党建理论的本土化创新,突出体现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本土化的早期实践、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活的灵魂的最早宣示。文中毛泽东立足实际,首次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115}。对于党内军内的教条主义则进行了批判,“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8]115-116}。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破除这种错误路线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

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8]111-112}。

除了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推行这一思想路线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实际调查”这一科学方法。“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8]115}针对调查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因为不作调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15]2}。

毛泽东上述论述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蕴含着“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和理论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除了理论上的阐释,毛泽东在调查实践上也是身体力行的。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他就先后做过多次调查。1927年引兵井冈后,他先后做了宁冈、永新两县调查;后在赣南、闽西又做了兴国、寻乌等多个调查。毛泽东不仅勤于调查,而且善于调查。调查之前,毛泽东会制定大纲,并将其分发给承担了相应任务的调查人员,人手一本。大纲的内容十分详尽,大体分为社会情况、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三类,每类皆标明详细的问题方向,例如,社会情况有地理情况、村落位置,“人口分布情况,大小姓,客居或本地的工、农、商、学、兵,分男女老少各多少”^{[11]194}等。注重调查的作风随着毛泽东等的示范和要求在苏区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苏区各地调查研究的热潮逐步兴起。尤其是红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每到一地,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摸清当地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调查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1]194}。例如,为了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事先做了诸多的社会调查,最终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出《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光辉的经典文献。据罗荣桓回忆:1929年12月初,毛泽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会,通过各种会议、座谈了解广大红军战士的思想认识,调查各种错误思想的主张、成因,并研究提出改正措施;在即将开会的12月中旬,毛泽东还组织了各级党代表的联席会议^{[17]33}。这样,毛泽东前前后后的调查研究持续了近一个月,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顺利起草奠定了基础,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可能。

(二) 话语体系上的本土化转换

“布尔什维克化”本义是俄语多数派,列宁用之作为苏俄共产党的名称,赋予了这一词汇鲜明的政党和政治色彩。作为苏区的民众,对这一外来词汇显然难以深入理解和产生共鸣,这就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词语本土化转换的实践要求。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主张,在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大语境下,提出了有别于这一话语的“政治化、科学化”的全新表述,体现了话语上的推陈出新。

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化”所指为何?我们可以从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和古田会议的决议中管窥一二。在与林彪的信中,毛泽东多次提到“政治”与“科学”,“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18]68},“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政治问题”^{[18]69}。这两处提及的“政治”一词都是相对于“军事”一词而提出的,“政治”应是对当时“单纯军事观点”的一种批判,强调红军既是军事组织,更要从事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等政治工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亦多次提到“政治”一词,“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8]91-92}“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8]92}这里的“政治”有几个特征:“大的方面”、非“个人”的、非“庸俗化”的。上述分析表明,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化”除了指赋予红军以军事之外的全新属性,还包含了“讲大局”(大的方面)、“讲组织纪律”(非个人的)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道德。

关于“科学化”,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就对这一话题有过思考,“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为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

……‘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18]70}“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8]74}从这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谓的科学化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有“规律”的;二是要有“历史和环境”的分析。实现这一科学化的方法,就是前述的调查研究,“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8]9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话语的转换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群众化、俗语化。如他在批评不注重调查之风时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体现了我们俗语常说的“闭眼说瞎话”^{[8]109}。他在赞扬调查研究功效时,直言: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既形象又通俗易懂^{[8]110}。

(三) 实践的本土化创新

党的建设布尔什维克化为苏区党的建设明确了方向,规定了目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开始了在公开合法状态下的首次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其背后除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整体部署和要求,更多的是中央苏区党和政府的努力和实践创新。

一是在思想建设上,探索开展“农民党”的思想改造。在中共中央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统思想中,农民成分占主导的苏区共产党组织是“农民党”,要进行针对性地改造,增加无产阶级成分,清除阶级异己分子。但苏区党和政府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能机械地强调党员出身,可以通过教育来改造提升,进而成功开创了以农民为主体对象的党的建设新路。早在井冈山时期,面对战争的现实需求,红军就大量地吸收旧军队的投诚士兵、农民和流氓无产者入伍,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强调士兵的无产阶级属性。但毛泽东也看到了旧军队和农民原有的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不足。面对党的成分非无产阶级化在思想上带来的混乱,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建军、建党思想,“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19]685}。

在教育的方式上,中央苏区教育学习采取许多因地制宜的方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结合实际 18 种军中思想教育方法,例如党报、训练班、谈话、小组会等等^{[12]170-171}。在地方基层,常规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各种列宁读书班,研究小组,学习会议”等^{[13]1712}。随机式的短期培训班是效果较好的一种临时性教育方式,即当下级党部到中央或省委接洽工作时,“随时组成小组给以训练”,三五人一个班,不固定地点,随时应用开展,既可行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13]1713}。

在灵活多样的教育学习方式下,苏区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龙开富对当时在毛泽东教导下因地制宜的学习情况进行了生动的叙述:“那时纸张很缺乏,毛主席就把抽完的香烟盒收集到一起,拆开,裁成象扑克牌大小的四方块,每张用毛笔一笔一划地写上一个字,教我们写。”^{[20]121}除了学习材料的就地取材,在教学内容上亦是融政治性与知识性为一体,毛主席教授的文字多为政治词汇和革命道理,诸如“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要实现共产主义”等等。这样让战士们“学了文化,又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20]121}。

二是在组织建设上,党支部成为基层的战斗堡垒。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强化党支部的建设,尤其是要加强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支部的发展。但中央苏区时期是激烈的战时环境,且因地处边区,基层支部工作的区域主要是红军和广大乡村,党在军队和乡村基层支部建设上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组织机构的建立是支部建设的第一步。早在 1927 年三湾改编时,红军就开始支部建在连上,从此,红军中的支部建设一直以连为起点,并明确“一切工作归支部”:“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10]774}支部作用的充分发挥得益于支部制度的日益规范和完善。1929 年 7 月,红四军第三纵队编写的《党员训练大纲——支部工作》明确了支部的 20 个方面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支部工作

的操作规范^{[11]117}。红军总政治部于1932年2月编印《支部工作纲要》和《目前巡视纲要和支部工作报告大纲》,对支部工作都做出具体规定和要求,为支部生活的政治化、科学化提供制度保障^{[21]188}。在中央苏区广大乡村,原则上是以乡为单位进行支部设立,各村则设党小组,有的大村则可以周围若干个村联合设立党支部。据统计,截至1932年4月底,江西全省共有998个党支部,分设在全省14个县1089个乡中^{[11]108}。

中央苏区支部建设的积极探索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推广,他在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对红四军支部建设的经验做法进行了着重介绍:“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22]240-241}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军事通讯》中,又登载了《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肯定了红四军在苏区的探索“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各地应积极学习^{[22]239-240}。古田会议对军队和党的建设的规定同样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8]85}。

三是在作风建设上,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23]1094-1095}。中央苏区时期是党的这一优良作风形成的重要阶段。

群众是力量之源、力量之本。中央苏区时期,面对残酷的战争局面,毛泽东鲜明地指出,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革命只有得到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才不会被反革命打破,“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最终夺取全中国^{[8]139}。密切联系群众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群众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8]138}。

密切联系群众要学会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学会汲取群众的智慧,在1941年撰写的《农村调查》序言中,毛泽东总结的调查技术充分体现了其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的求真务实思想。他提出在群众面前,要甘于当小学生,要不耻下问。“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们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15]16}如何做好群众的小学生,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成功实践。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从请谈话的农民吃饭、唠家常和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使原本拘束的群众最终放松下来,“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象自家人一样”^{[15]27}。

到群众中去,就是要深入群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苏区群众在一起,他在作寻乌调查期间,一边调查一边经常深入群众,与群众一起劳动。有一次,他碰上群众在田间拔稗草,便把鞋子一脱,卷起裤脚到田间劳动。“毛委员参加劳动不是事先与群众约好的,有时到那里看见群众劳动,就站一会,问群众累不累,抽袋烟,休息休息吧。谈开以后便一同劳动,边劳动边访问,边宣传革命道理。”^{[16]21-22}

苏区干部深入群众还形成了制度化安排,“每逢星期六为党的活动日。每天,党员带头帮助附近农民群众干活”。1931年春,红三军在江西东固镇休整,黄公略军长带着许多战士帮助当地群众春耕生产,他亲自参加犁田、挑粪,军长也和士兵一样,每天一身汗、一身泥水在田间劳动,老百姓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军民一家人,官兵一个样。”^{[16]157}各机关的周末义务劳动活动也普遍推行,红军军医学校“在每个星期日帮助春耕(现在正是帮助夏耕)的工作习惯上,差不多我们每个同志都自动地参加”^[24]。

四、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是党内“左”的错误发生的主要时期。在党的建设上,“左”的错误的体现主要是对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方针的机械推行,在实践中难免造成了一些弊端。但中央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建目标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的全面领导,开启了党的建设在公开合法状态下的全方位实践,明确了今后党的发展建设方向。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5]603}此外,中央苏区时期是党执政建国的首次尝试,为党和革命事业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正如陈毅所总结的那样“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个电报,指出苏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政权上、知识分子问题上、利用军阀矛盾上……曾经有十个错误,你们党史作结论就应该根据这些。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针对这十个问题接受了经验教训。没有中央苏区时期这段的好坏经验,抗日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16]5-6}据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央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中央苏区立足实际的实践探索之间的有机结合,二者相向而行,才共同缔造了中央苏区党的建设的历史功绩,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在布尔什维克化和本土化的三重变奏中实现了党的建设政治化、科学化的创新发展,开启了党的建设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并为当下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和诸多现实启示。

参考文献:

- [1] 贝拉·库恩.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 第2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 [2]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3]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2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4]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5] 赵生晖.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 [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7] 江西省档案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8] 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资料: 第3辑[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 [10]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5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江西省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 [12] 江西省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13]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 第3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5]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6]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共苏区风云录[M]. 内部资料, 1991.
- [17] 黄瑶. 罗荣桓年谱[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8] 毛泽东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0] 该书编写组. 回忆毛主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 [21] 杨小冬, 罗长祥, 陈世奎. 中央苏区党的建设史[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
- [22] 金冲及. 周恩来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23]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4] 张明云. 红军医学校的生产运动[N]. 红色中华, 1933-06-11(2).
- [25]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韩桥生)